

吴景平主编 中国金融史专刊

上海银行公会研究 (1927—1937)

王 晶◎著

■ 上海人民出版社

吴景平主编 中国金融史专刊

上海银行公会研究 (1927—1937)

王 晶◎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上海银行公会研究:1927 ~ 1937 / 王晶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中国金融史专刊 / 吴景平主编)

ISBN 978 - 7 - 208 - 08846 - 7

I. 上… II. 王… III. 银行—经济史—研究—上海市—1927 ~ 1937 IV. F83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4999 号

责任编辑 曹勇庆

封面设计 傅惟本

· 中国金融史专刊 ·

吴景平 主编

上海银行公会研究(1927—1937)

王 晶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市崇明县裕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8.75 插页 2 字数 255,000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8846 - 7/F · 1901

定价 28.00 元

总序

吴景平

众所周知，金融是经济的血脉，对于维系和促进现代社会经济的运作有着重要作用，与社会的方方面面乃至每个社会成员，有着不可或缺的关系，现实生活中的“金融热”有增无减，金融领域的独立性日益突显。随着中国经济与整个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密切，随着中国金融的改革开放的日益推进，金融诸领域的状况越来越受到各界的关注，对于金融学理、实务和实际运作的研究也得到极大的重视。

与理论和现实生活中的“金融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金融史研究的冷僻。长期以来，中国金融史只是被视作中国经济史的分支学科，或是金融学和经济史学的边缘学科。近三十年来问世的关于中国经济史的著作、教材不可胜数，但中国金融史有分量的成果仍然很有限。虽然在中国经济史的著作教材中或多或少会提及属于金融史范畴的内容，但大多散见于部分章节，主要还是服务于说明经济史意义上的观点。如讲到外国银行时，主要是叙述外国银行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控制及其对华资本输出情况，通常较少涉及甚至完全不涉及外商银行的资本构成、组织制度，特别是业务运作和经营管理；讲到钱庄、票号和银行等华资金融机构，着重说明这些机构与商贸、工矿业和政府财政政策的关系，略于以资金运动本身为主体、主线；为数不多的经济史著作讲到货币发行和流通方面问题时，也往往意在论证政府经济政策和社会经济状况，金融领域的问题很难作为主体和主线得到较全面的展开。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当然要有金融部分，但这不能取代把中国金融史作为相对独立的对象进行专门性研究。进而言之，中国金融史既属于经济学科的范畴，也应属于历史学的专门史范畴，应当如同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经济史等分支学科一样，在专门史的框架内有金融史相对独立的地位。而从其对象和方法来看，金融史还应当是经济学、金融学和历史学的融合，带有交叉学科专业的属性，应得到各相关学科专业的重视。

中国金融领域的演进有悠久的历史，在整个世界金融体系中别具一格。中国金融史研究有丰富的内容，兼顾中国金融演变的源与流，以中国历史上的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为研究对象，包括金融市场、机构和制度的沿革变迁，以及金融与经济增长、工商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等等方面。在新的形势下，加强对中国金融史的研究，特别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中国金融演变的状况、特色和在经济发展中所处的地位、作用以及两者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我们很欣慰地看到，自 2000 年起，六卷本的《中国金融通史》陆续出齐了。该著作分时期地对两千多年中国金融的变迁做了较全面的梳理。然而，中国金融史的丰富内容，需要我们进行更为专门性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金融史的专门性研究主要集中在货币领域，其代表性的成果是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但该书成书于上个世纪的 50 年代初期，只写到清代，且在金融机构、市场和制度等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有待于开拓。从成果较多的近代中国金融史的研究领域来看，在对金融机构的研究方面，以往主要集中在对旧中国国家银行、政府银行的研究上，如大清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研究较弱。近年来，已经见有对重要商业银行某一时期历史进行研究的成果，但与近代中国有数以百计商业银行的存续与运作的历史相比，相应研究成果很不够。北四行中的盐业银行、大陆银行、中南银行的研究还没有见到专门的著作。南三行中，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的研究著作尚未见问世。至于新华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四明银行、中国国货银行、国华银行、聚兴诚银行等，均未见研究专著。

如果中国的银行业历史通过若干银行的历史著作的问世，已经勾勒出大致的轮廓的话，那么对典型的本土金融业——钱庄业的研究，还是很不够的。目前较有分量的成果主要是 1937 年之前的，^①而且缺乏对具体钱庄的完整的个案研究，这与钱庄业内容丰富的历史不相称。从上海地区来看，钱庄业经历了上海由小渔村发展到现代

^① 参见郑亦芳：《上海钱庄（一八四三—一九三七）：中国传统金融业的蜕变》，“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丛刊，1981 年。

大都市的全过程,其业务也从简单的钱币找换扩大到一般银行的经营范围;在上海金融市场,钱庄业曾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在与银行业务的关系中处于强势地位;即便在银行业获得长足发展后的很长一个时期里,银钱两业在诸多领域里都起着并重的作用。但在资本来源、组织构成、投资与经营管理等方面,钱庄业难以适应现代化大生产和高度商品化的需要,更处于金融国际化潮流之外,甚至整个钱庄业长期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一度面临除了银行化便只有停歇的处境。但是,经济发展的多样性、不平衡性,即便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也存在着,零星、小额然而持续不断的金融业务既发生在都市内部,更在上海周边地区中小城镇属于常态,这就是钱庄业得以存续和一定发展的基础。在银行业居于上海金融的主导地位之后,钱庄业的存在不仅是银行业的陪衬。在保持与中小工商业和基层社会关系的同时,上海钱庄业仍然力图跟上时代的步伐,在资本来源和构成方式、经营管理制度等方面有所进步,整个行业维持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作为维持上海城市生活不可缺少的行业、作为金融业中始终不容忽视的力量,近代上海钱庄业体现了中国金融现代化的特定阶段性。至于钱庄业特有的与客户之间的互信关系,钱庄内部雇主、管理层与员工之间稳定的关系,似乎也不能简单地与落后、消极划等号。为了应对市场和社会环境的变迁,钱庄业的业务经营、管理方式,也有调整改革的方面。可以说,无论单个的钱庄还是整个钱庄业的历史,都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需要加以研究。

金融史研究中,外商银行可以说是一个空白领域。如何看待近代中国外商银行的作用和影响呢?长时期来,外商银行被视为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与中国本国金融业(尤其是商业行庄)有着不同的性质和作用。但已有研究者指出:应当看到,外商银行“既有一个掠夺中国经济的目的,又有一套开拓自身活动能量的手段。作为一个总体而言,它们的确有一套开拓发展自我天地的经营手段。它们有新的离岸金融市场,新的投资方式,新的支付工具,新的金融技术,新的银行管理方法。”^①如果说金融市场就是货币信用活动的市场,金融业是这个市场的主体,那么近代以来普遍从事中国本币业务的外

^① 汪敬虞:《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商银行,就应当如同华资银行、钱庄等一样,理应是整体意义的上海金融业的组成部分。但另一方面,在中国主权缺失的情况下,外商金融业在享有治外法权和其他特权的同时,在中国法统框架里长时期没有获得明确的“准入”,直到抗战结束后,外商银行才获准加入上海银行公会、成为上海票据交换所的交换银行,为中国银行业所接纳。而外商金融机构在体制、运作和管理方面的先进性,总体上也为华资银行业取法。在中国金融史的研究中,对在华外商银行的研究成果,不应当长期付诸阙如。

近代中国的钱庄业、银行业、信托业等金融行业开展业务经营的空间,就是金融市场。

中国金融史的研究以金融机构为主体,甚至长期是金融史研究的主流,这本身无可厚非。但是有金融业就有金融市场,除了关于金融机构的研究之外,还应有对近代中国或某一地区的拆借、贴现、内汇、证券、保险、外汇、金银等市场进行单独而深入研究的论著。对于诸多客户而言,金融机构的内部组织、管理与人事是一回事,但金融机构的如何开展业务、进行运作,则是更重要的。换言之,正是各类金融市场,把金融机构与客户联系在一起,金融市场的研究实质上是动态地研究金融业,是以业务、客户为中心地研究机构。应当看到,与对银行史的研究相比较,对中国金融市场历史的研究更显薄弱。近几年,陆续见有证券、保险、信托、外汇市场的研究成果,但总的看来很不够。中国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关系、金融中心地区的各种行情与国内其他地区各自市场行情之间的关系(如上海货币市场的利率确定和对异地的影响)、近代中国金融市场的财政属性与商业属性、金融市场行情与政局动荡之间的关系等等,都是金融史研究的重要对象。

至于近代中国的金融团体与组织,更是金融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银行公会、钱业公会等同业团体,其基础是诸多的行庄。行庄业务经营活动一方面形成市场,另一方面直接催生了各自的同业公会;而在上海地区,还进一步产生了联合准备委员会(钱业为准备库)、票据交换所、票据承兑所等常设专业组织。而金融同业规范的制订修正、同业之间关系的协调、同业与其他行业的关系处理、与社会的往来,以及与政府之间的联系交涉,则有赖于同业团体。诸如中

国交通两行、北四行、南三行这样的大银行，在业务和市场意义上可以被视作近代中国银行业的代表，可是它们对同业并不具有制约作用；但是银行公会、钱业公会的决议却不仅对会员银行、钱庄有制约力，还对非会员银行、钱庄有着重大影响力。可以说，认识近代中国某一特定金融行业基础和前提，就是了解该行业的同业公会，如上海银行公会是联合准备委员会、票据交换所、票据承兑所、银行学会等组织的发起者、管理者，其本质便是银行业自律、自我管理能力和现代化取向的集中体现。钱业公会同样具有这方面的本质和发挥着相应的作用。对于金融团体和组织的研究，应当得到学术界更多的关注。

中国金融史还应有对金融制度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尤其是近代中国金融制度的演变，不仅是政府的制度安排问题，还有业内的自律，主要通过金融业同业团体来体现，同时还应注意金融制度在文本上与实际运作的关系等等。这些方面都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从时段而言，晚清与民国时期金融史的研究基础较好，经过整理的史料和可资参考的文献较多，而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金融史的研究基础比较薄弱，某些问题的处理难度较大，应予以更多的关注和支持，近代中国的金融运作，上与政府财政有特殊的紧要关系，下与生产流通与社会生活领域密切相连，这两方面的关系是研究者不可忽视的。此外，近代中国不同地区之间的金融关系，华洋、新旧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中外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各主要金融政策和制度，具有代表性的金融思想、观点、主张、理论、学说，金融家及其企业等等，给有关的学者提供了十分广阔的研究空间。这些方面的研究可以为推进整个中国金融史的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在几年前便推出了《中国金融史专刊》，均为专题研究著作；以后，在继续陆续出版金融史研究的专著的同时，还将收入专题论集、专题资料集。我们期待着读者对于已经问世的各本专著的意见，期待着金融史研究同行赐稿，拓展中国金融史的研究领域，逐渐深化研究的层面。

2009年8月于复旦大学光华楼

目 录

总 序	吴景平	1
导 论		1
一、研究的现实意义及学术意义		1
二、研究状况及已有成果		3
三、主要研究问题的提出		8
四、研究中需说明的几个问题		9
五、本书架构、研究资料及方法		11
上 篇 上海银行公会(1927—1931)		15
第一章 寻求新的定位的时期		17
第一节 动荡中开始的 1927 年		17
第二节 新的利益链接		23
第三节 上海银行公会改组		28
第二章 上海银行公会的组织和运作		34
第一节 历史回溯		34
第二节 组织与管理		40
第三节 会员概况		47
第四节 对外联络		56
第三章 上海银行公会的基本职责		61
第一节 改进银行业务的努力		61
第二节 呈请修改银行业法规		68
第四章 上海银行公会与政府内债		74

第一节	接踵而来的债券与借款	74
第二节	内债利益的加深	79
上篇结论	87
下 篇 上海市银行业同业公会(1931—1937)	89
第五章 上海市银行业同业公会时期	92
第一节	组织与管理	92
第二节	上海银行家与银行公会	101
第三节	会员概况	112
第六章 内债问题的凸显	121
第一节	时局变化与债信危机	121
第二节	1932年内债整理	130
第七章 金融辅助机构的建成	138
第一节	上海市银行业联合准备委员	138
第二节	上海票据交换所	147
第三节	中国征信所和上海银行学会	154
第八章 金融危机与救济市面	161
第一节	工商小借款的提出与上海金融业恐慌	161
第二节	承兑汇票的使用与变革	170
第九章 立法咨询与政策辅助	177
第一节	储蓄银行法	177
第二节	所得税问题	186
下篇结论	193

结 论	195
附录一：上海银行公会历届管理层名单（1918—1937）.....	200
附录二：上海银行公会主要章程.....	208
附录三：上海银行公会大事记（1927—1937）.....	221
参考文献	256
后 记	269

导 论

上海银行公会是由上海银行业自发建立的民间自律性同业组织,以维护同业利益为宗旨。自1918年成立到1949年结束,这个组织存在了三十余年,历经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两个时期,为促进近代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推动其现代化进程发挥过重要作用。

本书以1927年3月至1937年8月为界,对上海银行公会进行系统研究,考察这个组织的概况及其发展变迁脉络,展现上海银行家群体概貌,探求该组织在协调及维护同业利益、参与近代中国重要的金融制度变革、推动近代中国金融业走向现代化过程等方面活动和主张,以期拓展拓宽民国史、近代史的研究领域,并为探索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民间团体与国家的互动关系、其在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等问题提供新的观察视角,也希望能为现阶段国家建立全面合理的金融监管体系,提供一些历史借鉴。

一、研究的现实意义及学术意义

依托于银行业的行业特点及与中央财政的关系,上海银行公会不可避免地与财政、经济、政治等社会诸方面发生密切联系,成为当时颇具影响力的社会团体之一,但相当长时间以来对这个重要组织的研究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外史学界对中国资产阶级及其团体与政府的关系问题较为关注^①,主要通过商会组织、金融财团等大概念对资产阶级进行整体研究。工商业同业组织属于代表行业利益的自律性团体,相对商会而言,具有更加鲜明的行业个性,亦是研究资本家群体与政府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工商业同业组织为对象,考察

^① 例如[美]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张恒忠《上海总商会研究》,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姚会元《江浙金融财团研究》等。

其与政府关系的个案研究虽已开始出现,但迄今为止专著性的研究仍不多见^①。

近代银行业研究是近代金融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与银行的个案研究相比,以银行公会为研究对象可从较广阔的视野勾勒出近代上海银行业发展的整体概况,进而更加全面、深入地探讨近代中国金融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上海银行公会是我国历史上建立最早的银行业同业组织之一,是适应时代发展的产物,具有历史的进步性,曾在维护与协调同业利益,稳定金融市场,抵御金融风潮,参与政府金融法规的咨询,辅助政府金融经济政策的实施,推动近代经济理论、金融学识的传播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对当今仍有借鉴意义。

近年来,我国银行业自律组织“中国银行协会”的建立及某些省市地方性银行公会或协会的组建,使金融业自律组织引起社会关注。目前很多经济发达国家都有银行公会组织,因具体国情不同,各国银行公会发挥作用的范围及对政府金融政策的影响力也有很大差别,但它们都在推进本国金融业的发展、辅助政府金融政策的施行、建立合理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等方面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我国正处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随着更多外国金融机构获得市场准入,金融业也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加强本国银行业间的协调与合作,维护本国银行业利益显得尤为迫切。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同时,我国金融业如何吸取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发挥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建立起符合本国国情的自律监督机制,以推动金融业的全面变革和进步,将具有积极意义。

^① 在2000年召开的“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同业公会研究已受到部分与会学者的重视。他们认为,民国时期同业公会得到十分迅速的发展,不仅体现了各行业组织从传统到近代的自身演变进程,而且在经济发展和社会整合等许多方面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目前学术界对同业公会的探讨仍较为薄弱,需要加强力量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除了综合考察之外,由于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同业公会往往各有其特点,因而还应重视各地区和行业的个案研究。(朱英:《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2003年,魏文享《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研究之现状与展望》一文则对该领域的研究状况作了较系统的回顾和介绍(《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可见,对同业公会组织进行系统研究已提上日程。

二、研究状况及已有成果

上海银行公会的现有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民间组织与国家现代化的问题；(2)上海银行家阶层的地位和作用问题；(3)上海金融业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问题；(4)某一时期上海银行公会的具体活动及其作用。

民国时期的研究者已对上海银行公会这个重要的组织有所关注。张辑颜 1930 年所著《中国金融论》，对上海银行公会的创始及早期活动等有简单介绍；同年，杨荫溥在《杨著中国金融论》中介绍了上海银行公会的发起、初期之筹建、内部规章制度的订定及早期活动，并希望银行公会能够继续扩充范围，增强势力，以成为金融界之中坚；上海银行家徐寄庼在《最近上海金融史》中，曾列出专门章节介绍 1918 年至 1932 年间上海银行公会的基本沿革及其会员银行的变更，但对上海银行公会这个时期的活动则少有涉及；1937 年上海通社主编的《上海研究资料续编》介绍了上海银行公会成立的情况，认为 1918 年银行公会的正式建立是上海国内银行团结的起源，此外还介绍了上海市银行业同业公会、银行周报社、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联合准备会以及票据交换所的基本情况^①。

20 世纪 80 年代后，国外学界较早关注上海银行公会研究的首推法国学者白吉尔。她的论文《上海银行公会(1915—1927)——现代

^① 上海银行公会及银行周报社方面也编辑了一些有较高参考价值的资料，如 1921 年上海银行公会编辑的《上海银行公会年报》，介绍了公会创立的历史及 1921 年前所开展的重要活动概况，同时还收录有上海当时主要几位银行家（包括银行公会的领导人物）关于银行公会及银行业方面的论著；1925 年 5 月为纪念《银行周报》发行四百号及庆祝上海银行公会新屋落成，时任银行周报主编的徐澄水出版《上海银行公会事业史》一书，对银行公会自 1918 年至 1925 年以来的组织沿革、主要会务纪要、重要活动等作了较为全面的回顾，对研究公会早期的活动有重要参考价值；此外，Frederic E. Lee 在 *CURRENCY, BANKING AND FINANCE IN CHINA* 一书中（*Publishing House, Inc, New York & London, 1982*）述及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已有之银行公会概况，其资料来源于当时美国驻北京的商务官员报告，报告除对北京、上海、汉口等地的银行公会予以简要介绍外，还谈到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的基本情况，对华商银行业通过该组织谋求币制改革的活动表示关注。

化与地方团体的组织制度》^①,从上海银行公会的创始人群体、早期的组织概况及对外关系、对外活动及重要主张等几方面对上海银行公会展开研究,指出民间团体在推动国家现代化方面的局限性,强调国家权力干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性;1989年,金公畴发表《解放前的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上海金融》1989年第3期)文。该文对解放前的上海银行公会的组建、早期活动进行了基本的介绍,也是20世纪80年代后国内对上海银行公会最早进行研究的文献。其后,国内研究者朱华、冯绍霆于1999年发表《崛起中的银行家阶层——上海银行公会早期活动(1918—1927)》一文^②,考察了上海银行公会在成立最初十年中谋求同业进步、扶助民族经济及参与社会公益事务等方面的努力,对上海银行家阶层的地位和崛起给予了充分肯定。文章认为,尽管上海银行家阶层作为民族金融资本人格化的代表还只能算社会新生儿,但已经可以看出是一支生气勃勃,颇具潜力的社会力量,应对他们在中国经济现代化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予以公允的评价。白吉尔与朱华、冯绍霆的这两篇文章分别从民间团体与国家现代化的关系、崛起中的上海银行家阶层为考察重点,为上海银行公会的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视角,时段均为上海银行公会历史上的最初十年。

2000年后,以上海银行公会为研究对象的成果陆续出现,并交相辉映,构成了上海银行公会研究的小高潮。如吴景平、王晶的《“九·一八”事变至“一·二八事变期间的上海银行公会”》^③,是第一篇以1927年后的上海银行公会为研究对象的文章。该文考察了上海银行公会自“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事变间的主张及活动,肯定了它在特殊时期在稳定金融市场,维护金融业利益方面的作用。张秀莉的《上海银行公会与1927年的政局风潮》^④,则论述了1927年政局风潮中上海银行公会对各派政治势力的态度,重点分析了这个组织与南京政府当局的关系,对1927年上海银行公会在新形势下如

^① 《上海研究论丛》第3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② 《档案与史学》1999年第6期。

^③ 《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

^④ 《档案与史学》2003年第1期。

何作出最终选择给出了详细说明。

上海银行公会与国民政府的关系研究在这个时期也通过具体的个案分析而进一步深入。如吴景平教授的《从银行立法看30年代国民政府与沪银行业关系》^①及《评上海银钱业之间关于废两改元的争辩》^②，这两篇文章也为此后其他学者研究上海银行公会与政府在金融立法、币制改革等方面的关系时较多引用。

2002年，上海银行公会的研究得到韩国学者、我国台湾学者以及大陆学人的共同关注，无论是从文献的挖掘，还是从研究时段或范围以及研究专题等方面都有所拓展。同年5月，在复旦大学举办的“上海金融的现代化与国际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上海银行公会最新研究动态和成果得以集中展现。如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的《折冲于官商之间：1929—1931年上海银行公会改组风波述评》，通过对1932年上海银行公会改组风波的研究，考察了上海银行公会改组的过程，及在此期间它与南京政府、上海市地方当局及上海市商会等团体的关系，文章认为“1929—1931年上海银行公会的改组风波，本质上是南京国民党中央对工商界实施控制和工商界反控制的体现”。韩国汉城（今首尔）大学金承郁提交的《北京政府时期的上海银行公会述略》，介绍了上海银行公会在北京政府时期的组织概况及其为实现废两改元而进行的努力。我国台湾学者林美莉的《抗战时期上海银行公会的活动》，主要以上海银行公会在抗战时期的活动为中心，介绍了这个组织在特殊时期与各方政权的关系及发挥的作用。上海市档案馆研究馆员陈正卿的《上海银行公会（1918—1949年）始末、作用影响及现存档案状况》，对上海银行公会及其他金融辅助组织——中国征信所、上海银行学会的基本情况进行了简略介绍，同时就上海银行公会现存档案状况给出说明。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王晶的《1927—1937年上海银行公会述略》则论述了上海银行公会1927年至1937年的发展沿革，它与社会各个层面的关系及在推动上海金融业现代化过程中所作的努力，并兼论它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对这个组织十年

^① 《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

^② 《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5期。

间的活动及主张进行了初步研究^①。

到 2003 年,上海银行公会的研究已取得初步成效,张天政据此对海内外上海银行公会的研究状况进行了阶段性小结,并提出了上海银行公会有待研究的一些领域和拓展空间,如各时期上海银行公会与外商银行公会的关系,抗战后的上海银行公会及该组织的结局,各时期银行公会领导人的思想、系统的政治主张、融资主张、市场意识等等,均值得进行研究。^②

此外,针对上海银行公会后期的组织变化及相关活动,也有研究成果出现。比如,张徐乐的《银行公会结束始末论述》(《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 年第 3 期),对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面临新旧体制的转型,上海银行公会是如何应对、如何接受改造以至最终走向结束的过程进行了研究,为上海银行公会后半期的研究作了必要的补充。

2003 年至 2004 年,随着三篇以上海银行公会为研究主题的博士论文先后完成(复旦大学王晶博士论文《上海银行公会研究 1927—1937》、华中师范大学郑成林博士论文《从双向网络到多边桥梁》、复旦大学张天政博士论文《上海银行公会研究(1937—1945)》)以及其

^① 目前学界其他文章涉及上海银行公会的有:徐鼎新的《旧上海工商会馆、公所、同业公会的历史考察》,对上海近代同业组织的产生及演进予以较详细的论述,部分内容涉及上海银行公会,并对上海银行公会在维护同业利益,促进近代金融业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予以肯定;宋时娟的《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档案与史学》2000 年第 3 期),在论述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这个重要的内债保管机构的内部运作及活动时,从内债的角度考察了以上海银行公会为代表的上海工商各业与政府财政所结成的互动关系;王晶的《1932 年的公债风潮:国民政府与上海金融界关系述评》(《档案与史学》2000 年第 3 期),通过 1932 年国民政府停付内债本息风潮个案研究,考察了以上海银行公会、上海钱业公会为主体的上海金融业为维护自身利益进行的活动,展现出上海银行业与政府借内债所结成的利益关系及其矛盾;马长林的《民国时期上海金融界银团机制探析》(《档案与史学》2000 年第 6 期),探讨了二三十年代上海金融界组织的几次银团活动,虽然上海银行公会不是该文的论述重点,但文章却大量涉及上海银行公会及其会员的活动,有助于了解上海银行家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情况;吴景平的《从银行立法看 30 年代国民政府与沪银行业关系》(《史学月刊》2001 年第 2 期),则从政府的金融立法问题出发,论述了以上海银行公会与国民政府在银行法规上的交涉及两者间的互动关系。这些文章都为上海银行公会的研究提供了较新的视角。

^② 参见张天政:《海内外关于上海银行公会研究的新进展》,《历史教学》2003 年第 9 期。